

戰後初期台灣報人群體的多重「感知結構」^{*}

邱家宜^{**}

投稿日期：100 年 12 月 23 日；通過日期：101 年 5 月 16 日。

^{*} 感謝三位匿名評審所提出的批評與建議，讓本文得以更清晰、周延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

^{**} 作者邱家宜為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解嚴以來，國家認同的分歧一直是台灣社會內部緊張的最大來源，新聞媒體的立場在統獨議題上隔空對陣、壁壘分明，欲探究這個現象，必須回到戰後台灣的歷史過程中去尋找原因。本論文選擇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四位報人，嘗試抽繹其各自不同的「感知結構」，做為理解其認同歸屬的基礎。而不論是影響力迄今未衰的曾式「感知結構」、強調台灣主體意識的吳式「感知結構」，或兼及本土草根情懷與中華文化幽思的李式「感知結構」，以及伸張言論自由、民主程序正義的雷式「感知結構」，目前正同時顯現於當今的台灣社會，也同時都是台灣新聞媒體工作者所承繼的文化遺產，並成為構築下一波新興「感知結構」的重要質素。

關鍵字：吳濁流、李萬居、曾虛白、感知結構、雷震、認同

壹、研究動機與提問

二次大戰結束至今，在經歷四十多年（1945-1987）政治高度管制，與二十多年的自由市場競逐，台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之所以會發展出當前的樣貌，跟這個社會的許多其他面向一樣，都具有歷史的獨特性。如今，當新聞媒體在政治、社會，甚至文化議題立場上各自選邊，並以「藍媒」、「綠媒」、「統媒」相互指稱，彼此間壁壘分明，簡單的「媚俗」、「譁眾取寵」或「市場導向」，並不能適切解釋為何這些新聞媒體各自選擇了其當前的立場。由於新聞媒體本身就是各類社會論述的集散、加工與產製中心，新聞媒體的議題設定往往相當程度反映社會明顯的或潛在的關切，尤其是當這些議題呈現歷久不衰的狀態時。

1988 年台灣解除報禁，過去公開對新聞媒體進行直接壓制或扶植的政治力逐漸後退，既有或新興的新聞媒體，透過事業資本與市場的互動，容納了更廣大的社會光譜。大多數時候，消費者取向的市場法則，在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中，都造就了大量五光十色的名人八卦、商品消費訊息等內容，顯示出其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一致的「去政治性」傾向。但每逢選舉、台海兩岸互動等重大政治事件，台灣的新聞媒體就又都顯現出高度的政治性，但這個「政治性」並非對應於「去政治性」的一般政治性，而是經過立場選擇的政治性。這些在政治立場上的異質性，既無法完全歸因於市場計算的結果，亦無法簡單的用各自服務於政治鬥爭來完滿解釋。觀察其與各式社會動員間的相互呼應，隱約可以看到這些異質性似乎原本即深植於台灣社會的各個層面。一個合理的假設是：台灣錯綜複雜的近世歷史軌跡，是造就這些異質性的淵源，繼承了不同歷史遺產的報人（本研究以較廣定義來界定「報人」，其含意類似英文的

「newspapermen」，指為報紙工作的人，除撰寫報導、評論者外，也包括從事編輯、翻譯、發行、業務等工作的人）在進行社會論述再生產時，因而出現政治立場分歧、國家認同殊異狀況。

本研究將以新聞史取徑（approach）來檢視：究竟是那些異質性造成了這種分歧與殊異？透過對個別報人生命史的掌握，對戰後台灣社會中幾個不同屬性的報人群體做類型建構，¹ 勾勒其所代表的某種「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並進行比較，² 以探究這些異質性及其由來。希望能為理解當時與後來的台灣新聞媒體事業，甚或整體台灣社會的特徵，提供有意義的線索。

貳、作為概念工具的「感知結構」

本研究以英國文化研究巨擘 Raymond Williams 的理論創見「感知結構」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因此首先必須針對此概念進行扼要介紹。Williams 關注工業革命前後英國社會的文化變遷，「感知結構」是他嘗試用來解釋文化變遷的機轉，其所要強調的，並非一具有明確界線的現狀描述，而是指向一種傾向變動的相對不穩定狀態：

理解文化行動最大的障礙即在於，經驗如何常態、立即的轉為具體建制。（過去的）分析通常集中在已經建立之各種制度、形式與經驗之間的關係，因此現在如同過往，所被注意到的皆為固定明確的既存形式，而定義上屬於活生生之現在（living presence）的那些部份，卻總是隱遁著。……我們就必須創造新的詞彙來形容難可否認的當下，不只是暫時的當下而且是一特定的現下存在（present being），不一定是一種具體或固定的制度產物，而是一種對社會的認知（discern）。一種無法忽視的物理性的身體對制度、形式、

處境位置的感知與理解（Williams, 1977, p. 128）。

從對上面引文的解讀可以發現，如果以文法的時態來比喻，Williams 創造「感知結構」一詞，是希望跳脫研究者在理解過去的社會時，往往「以過去完成式來理解現在進行式」的盲點，而試圖找尋並還原過去時空中，曾經活生生地存在的那個現在進行式。

長期擔任劍橋英國文學教授的 Williams，最早是從文學作品來談感知結構的。但在他的用法中，「感知結構」並不只表現於文學。在《長遠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中，他以世代差距來進一步闡釋所欲表達的「感知結構」概念：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世代差距，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共同語言（the “same” Language），或當我們讀到外來者對自己社群的評語，以及觀察那些雖欲模仿我們，但還未得神髓者言行風格間的細微差異。對於此種清晰可辨的特殊與原生風格而言，幾乎所有的具體描述均嫌粗糙，假若如此，則當我們研究任何過去時期，均應將自己擺放在訪客、學習者，一個來自不同世代的客人的位置。我建議以「感知結構」來形容此一欲表達的概念：其具體明確如結構，但顯示於行為的最細微、最不明確處（Williams, 1975, p. 48）。

這段重要引文中，出現對掌握「感知結構」概念的兩個說明方式，一是從時間軸—不同世代—來理解：淺白的說，人類社會之所以會有「代溝」，是因為兩代之間的「感知結構」不盡相同，而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溝通所導致；一是從空間軸—外來者與本地人—來理解：不同社會有自己獨特的「感知結構」，外來訪客必須透過學習才有機會適切掌握。從時間軸來看，研究者即使研究的是自己所身處社會（對 Williams

而言，是工業革命前後的英國社會）的過去，也必須將自己擺在「訪客」、「學習者」的位置。從空間軸來看，不同的人類社會，會有不同的「感知結構」。而即使是在同一時間點的同一社會中，經常也存在不同的「感知結構」。對一個異時或異地的研究者或來訪者而言，要進入此一特定的「感知結構」脈絡，是需要經過一番學習與努力的。Williams 在他的小說作品《邊境之鄉》（*Border Country*）中，描寫一位從偏鄉到城市中大學讀書的青年所經歷的文化衝擊，研究者認為書中情節正是 Williams 自身經歷的寫照（Michele, 1993, p. 27）。此例非常適合用來說明 Williams 所指涉，同一時代中不同區域間所存在的「感知結構」差異。不論是在時間軸的流變上，或空間軸的跳躍上，「感知結構」都具有不同的內容樣貌，這也是為什麼他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書中的「感知結構」專章中，標題的「感知結構」是用複數來表達的（Williams, 1977, p. 128）。

Williams 特別指出「感知結構」在社會溝通上的重要性，他認為一個社會的「感知結構」，具體呈現於一「深層社群」（deep community）中，關乎一個社群中人們如何彼此理解與互動、看待或對待：

就某種意義而言，感知結構即為一個時代的文化：…通常是不經意的，透過留存得比其載體更久的少數溝通紀錄，表達出那種活生生的感受（living sense），以及那種使溝通成為可能的深層社群的存在（Williams, 1975, p. 48）。

簡言之，本研究之所以選擇 Raymond Williams 的「感知結構」作為理解戰後初期台灣報人個體及其社群的參考架構，係基於下面幾個考量：

1. 「感知結構」預設了「社會人」。個人並非孤絕於世間，而是處在一分享共同歷史文化經驗的群體中，「感知結構」係存在於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社會構造，是一共同的認知或溝通基礎，雖可以從個體生命歷程去進行探求，但所欲呈現的，並非只是個體的特殊性，而是映照、聯繫於個體所身處的時代與社群。
2. 「感知結構」雖然稱為「結構」，但其概念的特色，在於強調社會裡的個人對時代及周遭環境的感受與體會，不僅指涉著社會結構，更強調相應於社會結構的某種「心理結構」，本研究係針對二次戰後台灣的報人，因此具有對象的適切性。
3. 歷史發展的動能究竟從何而來？一直都是歷史與社會研究所關心的最主要問題之一。「感知結構」不僅可以反應行動主體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的靜態結構，更透過個體或集體行動者的能動性，讓歷史發展蘊含結構內部的可變動性，符合本研究希望探究過去對當代之影響的研究旨趣。

在台灣社會文化議題的相關研究中，過去有不少學者（王明珂，1997；方孝謙，2007；施正鋒，2000）直接以「認同」做為論述的概念樞紐，但由於在本研究的提問中，認同樣態做為不同社會群體間的一種異質性，本身就有待解釋。從還原報人個人生命史歷程以追索其「感知結構」，才能有效解釋幾位報人的認同樣態之所以分歧的根源，而這也是本文所將採取的論述策略。

Williams 的「感知結構」理論突顯個別行動者在某種集體意識下的作為，這點對於研究報人尤其有意義，James Carey 就曾經清楚指出這點。James Carey 認為，新聞史是一種文化史，而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的任務是要還原過往的想像形式與歷史意識，其目的不僅是心理學上所說的，傾向以個體為單位的「認知」（cognition），更是

Raymond Williams 所說的，社會的整體「感知結構」（Carey, 1997, p. 90）。因為不斷從事紀錄、描寫、評論等文字生產的報業（新聞媒體）從業者，相較於一般人，更是在其所屬的感知結構中的積極行動者，Carey 在談論新聞史時，也注意到新聞工作者的特殊角色。他指出，新聞產製者（記者、編輯）並不只是被動「反映」某些共同的意識與感知結構，他們還扮演「建構」此共同意識的主動角色。他舉美國的黑人媒體研究為例：「我們研究黑人媒體不只為其反應了黑人意識，或將其作為黑人社會史的素材，黑人意識是被『鍛造』（forged）進入黑人媒體的。黑人媒體是黑人意識被產製，並受制於黑人新聞規範（the canons of black journalism）的場域（Carey, 1997, p. 92）。

既然共同的「感知結構」（單數）是社群內賴以溝通的基礎，那麼當不同文化相互遭遇，不同感知結構（複數）間一時無法接軌---如同戰後台灣社會的歷史場景，那些被歷史潮流所匯聚的社群間的溝通又會是怎樣的歷史場景？嚴重溝通不良，甚至爆發激烈衝突？經歷一段時間的互動後，這些「感知結構」又會有何種變化？會因為彼此的匯聚、衝突而激發出另一種「新的感知結構」嗎？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特定歷史過程中去進行考察。

參、戰後台灣的四種報人類型³

1945 年，當戰敗的日本將台灣交還給當時仍處內部分裂狀態的中國時，經歷半個世紀的分治，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報人，在歷史洪流中匯聚於台灣，原本各自開展、脈絡不同的「感知結構」，如今必須匯入共同的時空環境---戰後的台灣。

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文化運動中堅份子，有許多都參曾與辦報，

例如林獻堂、蔡惠如、林呈祿、羅萬俔等人對《台灣》、《台灣青年》、《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及《興南新聞》這一系列在淵源及發展上一脈相承之報業的持續參與（葉榮鐘，1983；楊肇嘉，1967）；這股透過經營報紙所傳達的社會力，在戰後到二二八事件之前仍持續了一個短暫時期。這期間，有林茂生、黃旺成、王白淵創辦《民報》（李筱峰，1996）；王添燈、蘇新、呂赫若創辦《人民導報》（吳純嘉，1999）等。對台灣本地報人而言，政治宗主一夕轉換的最大難題，不是在國籍上從日本人馬上變成中國人，而是日治五十年間，已廣泛使用的「國語」——日文（語），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全面改成中文（語），使這群人直接面臨表達工具不足的「失語」困境。幼年受祖父薰陶而可以用中文寫作的吳濁流，在〈瘡疤集（上卷）自序〉中提到：「過去的日文作家，因為日文無用武之地，國文又未成熟，所以只好萎縮地悶著，在此新時代下，無為無策……」（吳濁流，1977b，頁189）。

即使中文能力足以因應，大部分人也在在政治、文化上出現適應不良。不少本地報人在光復後雖繼續在新聞媒體中工作，但卻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遇害或被捕。例如《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煉（遇害）、總經理阮朝日（遇害）（李筱峰，1990，頁130-147）；《民報》記者王白淵（被捕、監禁）、《民報》主筆黃旺成（被通緝、逃亡）、《民報》記者駱水源（自首、監禁）（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189-190）等。吳濁流則從此離開新聞界，轉向文藝。

對為數雖然不多，但因為與台灣的地緣聯繫，而在國府接收初期角色關鍵的「半山」報人來說，戰前心懷祖國，戰後則趁勢回鄉發展，協助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一方面深知台灣，一方面瞭解大陸，「半山」原本是溝通睽隔半世紀的中國政府與台灣人民的最佳橋樑。不僅二

二八事件前台灣的《台灣新生報》經常呼籲中央重視台灣社會民情，二戰結束前後，大陸台籍人士人於重慶所組織的「台灣革命同盟會」之機關刊物《台灣民聲報》，也有許多相關言論。但因為不在權力核心，雖希望扮演下情上達的良善溝通者角色，但對於中央治台的各種建言，卻難免於被邊緣化的命運（楊錦麟，1993，頁 113-117）。

台灣光復後從大陸來台的報業從業人員，則多半具有黨政軍背景（但也有少數例外，其中最為人知的，是下文將會提到的雷震，標榜「無黨無派」的《自立晚報》發行人李玉階，以及到 1988 年報禁解除前都被禁止辦報的成舍我），對國府的向心力與忠誠度普遍很高。或以黨政軍報紙為根據地，再行自創新報：例如中央日報的錢震等人，邀中央日報編輯薛心鎔一起辦大華晚報（薛心鎔，2003）；或以過去在內地辦報的經驗試用於台灣：例如李上根邀辦過杭州《掃蕩報》的張煦本辦台中《和平日報》（張煦本，1982），創大華晚報的薛心鎔在山東曾辦過青島《民言日報》（薛心鎔，2003）。

根據上述討論，我們大致可以看出：若從造成歷史經驗殊的地緣關係來分類，可以分出台灣本地報人、半山報人、大陸來台報人三種不同類型。而在大陸來台報人中，則可再分殊出依附國府政策，及批判國府政策兩個大類。其中，批判國府政策的，個案雖明顯少於依附國府政策的，但這類個案卻不只一次出現與本地報人聯手合作，打破原始地緣界線的情形：例如李玉階與雷震都曾與吳三連合作（呂東熹，2010；林淇養，2003）。並且對後來的報業發展產生顯著影響。為增加分析的洞察力與有效性，研究者自無須受限單一分類原則，而應以擴大分析的有效性為前提，兼採不同的原則來考慮分類方式。也就是在考慮原始地緣關係的第一層分類原則下，對大陸來台報人部份，再納入對國府政策依附與否作為第二層分類原則。

經過這些面向的考量後，本研究選出吳濁流、李萬居分別代表台灣本地報人及半山報人群體；在大陸來台報人方面則以曾虛白、雷震分別做為依附國府政策與批判國府政策兩類的代表。這樣的分類並非試圖完成四種互斥的報人類別，而是為了有利於觀察不同的報人群體，如何代表其背後的不同「感知結構」，在戰後台灣報業的舞台上各自、卻同時也是共同的演出。

之所以選擇吳濁流（1900-1976）代表台灣本地報人，⁴並不是因為他擔任記者的時間較長，或在報社中的位置高（最高只做到校對組長），而是因為在吳濁流身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殖民地知識份子的「認同矛盾」與「多語困境」，而這些政治紛亂、文化交錯複雜的歷史情境與心理情結，又都透過他先是記者，後是作家的筆端，具體的做了傳達。過去一般所熟悉的是文學家吳濁流，而不是新聞記者吳濁流。但從他《台灣連翹》、《無花果》、《南京雜感》幾本傳記性著作的文字中可以確知，吳濁流在光復前後曾經在南京、台北兩地擔任過約五年的記者：1941-1942 年南京日軍佔領區《大陸新報》記者；1942-1945 年台灣《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報》記者；1945 八月日本投降，繼續擔任《台灣新生報》日文版記者、校對組主任；1946《台灣新生報》日文版停刊，轉任《民報》編輯，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民報》被停刊（整理自《無花果》、《台灣連翹》）。

二二八事件後，他雖轉入非新聞文類的寫作，但對自己的記者身份卻是有明確自覺的：

最近痛切地感到的是，當時的新聞記者，一年比一年減少了。即使尚在人間的，不是轉業就是隱居，幾乎都已和筆絕緣。視野比較廣闊的新聞記者如果不執筆，將來這個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在二二八事件已過去二十年的今天忘卻的固然不少，也有無論如何

不能忘懷的，……當時我是民報的記者。在這之前是台灣新生報的記者，所以在了解事件發生前後的關係上，正佔有很方便的立場（吳濁流，1988，頁 34）。

很顯然的，他自我定位為一個「視野比較廣闊的新聞記者」，抱著「不容青史盡成灰」的心情寫下自傳性質的《無花果》及《台灣連翹》。而這兩本書後來也確實成為研究二二八歷史的重要材料。

相較於本地報人部份，在「半山報人」部份，選擇李萬居（1901-1966）則幾乎無需任何猶疑。⁵ 與李萬居一樣具有「半山」身份的報人，還有與王添灯、蘇新等人一起創辦《人民導報》的宋斐如（1903-1947），以及謝東閔（1908-2001）、林頂立（1908-1980）等。宋斐如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謝東閔曾擔任《台灣新生報》董事長（謝東閔，1988，頁 230），林頂立參與《全民日報》的創立（卜幼夫，1962，頁 43），但謝東閔後來官至副總統，辦報只是插花，林頂立曾任省議會副議長，政治人物成份亦大過報人。

李萬居生於雲林窮鄉，早年喪父、青年喪母，二十四歲就西渡大陸求學，在當時中國青年勤工儉學風潮影響下捨棄具語言便利的日本，選擇留法（楊錦麟，1993，頁 27-31）。對日抗戰期間被徵召從事具高度危險性的對日情報工作，確立了戰後以「半山」身份受國府倚重的背景。但在「半山」集團中，李萬居卻是最不馴服的一個角色。吳濁流在《台灣連翹》中指出，包括劉啓光、林頂立等人在內的「半山集團」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將兩百多個台籍精英「黑名單」提供給長官公署作為搜捕依據（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 180）。但他對李萬居的蓋棺論定則是：「李萬居雖然也是半山……從半山的行列悄悄地脫離開來，投注畢生心力於自由民權運動……透過公論報，以堂堂言論戰鬥到底，確實是一名鬥士。」（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 224-225）。

被選定參與第一批來台接收團隊（葉明勳，1995，頁 15-16；楊錦麟，1993，頁 127），顯示李萬居是當時國府治台準備倚重的台籍人士，他到台灣後，立刻接掌了政府機關報《台灣新生報》（由原《台灣新報》改組）。但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卻讓李萬居陷入前殖民地台灣子弟與大中國智識份子的兩難無解困境：他一方面深刻體會國府治台措施的諸多不當，必須諍言逆耳、為鄉親發聲；一方面又對台灣如何儘速融入中國深感迫切。夾處在國府統治集團與台灣父老鄉親之間，他不像許多半山採取馴服姿態，反而自創《公論報》、參選民意代表，從基層民間尋找支持，走上他孤臣孽子的不歸路，卻也成為日後台灣政治民主與言論自由的標竿性人物。

如同李萬居，雷震（1896-1979）可以說是與其同一類型報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⁶ 因其所辦的《自由中國》言論批判時政、當道，而被羅織入罪，遭軍法判刑十年，雷震是台灣戒嚴時期最著名的文字獄受害者，可以代表大陸來台報人中，試圖在威權統治下扮演國府「諍友」的一群知識份子。

但其實，大陸來台的報人中，辦報紀錄最輝煌的要數非國民黨籍的成舍我（1898-1991），但他在 1952 年從香港輾轉到台灣之後，卻被蔣介石欽點禁止辦報（中國人民大學港澳台新聞研究所，1998），只准他辦新聞專科學校（即世新大學前身「世界新專」），一直到 1988 年報禁解除，他才以九十歲高齡，辦了《台灣立報》。由於他在台灣辦報的時間點，已經超過本論文聚焦分析的年代，對本文所關注的問題，其代表性反不如雷震。

相較於雷震、成舍我的異議色彩，曾虛白（1895-1994）代表外省來台報人的主流。⁷ 他並不是 1945 年臺灣光復以後，最早到台灣來的新聞記者或報人，但卻很可能是光復初期影響最大的一個，其對台灣新聞

實務與新聞教育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日。根據他的自傳，1949 年初，他以前國府新聞局副局長的平民身份來台，被蔣介石倚為穩固國府在臺政權的主要文宣策士。除了國民黨改造委員（1950 年八月起）的重要黨職，同時還擔任中央社社長（1950 年九月起，至 1964 年）、中廣副總經理（1949 年十一月起），並親自主持中廣的「談天下事」節目長達 20 年（1950 年 9 月起，至 1970 年 9 月；曾虛白，1990a，頁 493-494），1954 到 1955 年間，擔任政治大學在台復校設立「新聞研究所」的總舵手，也因此成為往後數十年台灣新聞實務與學術界許多精英們共同的老師。1962 年開始，他又主導台灣第一部《中國新聞史》的編纂。1968 年該書出版後，成為大學傳播科系教材與必讀課本（曾虛白，1990b，頁 741）。他的這些權力位置與研究、論述工作，對往後台灣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專業與自我角色的認知影響極大。他是這樣理解新聞記者的角色的：

諸葛亮要讓劉阿斗遇事都能耳聰目明，看得準，懂得清，需要靈活的溝通，需要即時的啟發，擔任這溝通啟發者，捨新聞記者，無人能挑得起這副擔子，因此，中國記者是使諸葛亮的「知」變成劉阿斗的「知」的中間搬運者，可同時也是把劉阿斗這位主人翁的要求變成諸葛亮奉命執行圓滿完成任務的一座橋樑。綜合言之，新聞記者是整部中國政治機構的潤滑油，全靠他的傳播功能，使中國政府與人民息息相通得到最高團結合作的效果（曾虛白，1990b，頁 736）。

在這個比喻中，人民是有權力但無識見與才能的劉阿斗，政府則是鞠躬盡瘁於人民的諸葛亮。新聞記者則是溝通、團結兩者的「潤滑油」。直至 1980 年代報禁解除後，這種對新聞記者的角色定位，依舊深深影響了台灣新聞從業人員的自我認知。

肆、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比較

相較於「感知結構」概念的仍然有待詮釋釐清，霸權（hegemony）則是一個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的社會學或政治學上的概念。提出此一創見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用此來指稱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透過文化、教育等滲透於人們生活周遭的綿密社會機制來貫徹統治權力的形式與過程（Gramsci, 1995, p. 157, pp. 357-359, pp. 395-396）。Williams 對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評價甚高，認為這個在法西斯監獄中所發明的理論概念，具有能夠自我衍伸以涵容歷史發展動態變化的延展性：「霸權概念不僅只是一種消極存在的宰制形式，而是不斷被更新、再創造、保衛與修整的。它也會不斷面臨來自外界力量的抵抗、阻擋、取代與挑戰。」（Williams, 1977, pp. 112-113）

學者 Alan O'Connor 便策略性地透過霸權來理解「感知結構」，他認為，Williams 的「感知結構」概念所欲對應的，是霸權形成前，那個事情仍具可變化性的階段或層次，他指出：

霸權不是一整體系統或意識形態。它牽涉掌控與從屬關係的生產，掌控性的實存（dominant reality）中包含其他可能選項（alternatives），但卻也排除了許多可能的實踐。研究最重要、最吸引人的部份，往往是還未明朗的那些面向，或者是關於實踐與生產之新場域的浮現。其在各種形式及藝術上的開放或眾聲喧嘩（multi-voiced）的特性，通常是觀察歷史變動的沃土。『感知結構』這個新概念，主要就是針對一個新的或已變遷的文化形式正要浮現前（pre-emergence）的時刻……」（O'Connor, 1989, p. 115）。

Paul Jones 在探討 Williams 的文化社會學時，也特別強調 Williams 對 Gramsci 霸權理論的推崇。他並指出，Williams 甚至認為，霸權概念提供了「最好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分析」、「開創了歷史分析的新紀元」（Jones, 2004, p.73）。Jones 把 Williams 對霸權的詮釋整理出一個表（表一），根據 Jones 對 Williams 理論的理解，「感知結構」可以被視為霸權理論概念架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萌生反對既有霸權的社會實踐上，「感知結構」浮現成為要角。

表一：「感知結構」在霸權場域中的相對位置

社會文化實踐位置	在霸權中的角色	例子
掌控的（dominant）	意義與價值的核心系統	英國社會在特定時期的（文化）霸權
殘餘的（residual）	過去曾經一度掌控，目前存續但活力消退，可視為核心系統的反對者	鄉村社區的概念、教會
浮現的（emergent）	經常得力於新興階級、新社會運動的新（文化）形式，可視為核心系統的反對者	十九世紀英國社會中所流行叛逆離經的通俗讀物
即將浮現的／感知結構（pre-emergent / structure of feeling）	尚未被清楚表述的「溶解狀態的社會經驗」，處在形成具象化形式之前的階段	Williams 在《關鍵詞》（Keywords）一書中所討論的語意的歷史變化

資料來源：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p.73), by P. Jones, 2004,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本表格較原文稍簡化）

從 Jones 的這個表中可以看出，Williams 所欲凸顯的「感知結

構」，是蘊藏在社會文化實踐的最不明確、最浮動，也因此最具可變動性的部分。根據此表，「感知結構」在霸權場域中所在的位置，確實相當能傳達「感知結構」所具備之萌發的、幽微的與動態的特徵，但由於「感知結構」亦可以看做是一個時代的整體文化在個人身上的體現，是其廣泛組織中所有元素之特有成果的活現（Williams, 1975, p. 48），因此 Jones 將「感知結構」僅對應於霸權場域中的一部分，可能就嫌太狹隘了。根據 Williams 以「感知結構」來涵蓋一個時代整體文化的用法，吾人應將「感知結構」給予更寬廣的理解，反過來將「感知結構」理解為 Jones 所設計的上列表格的全部：亦即，就一個生存於社會中的個體行動者而言，不論是「掌控的」霸權核心、「殘餘的」歷史遺緒、已「浮現」的當前情境、或者「即將浮現的」新興趨勢，都是其當下「感知結構」的一部分，成為其對環境進行回應、和群體或群體中其他個人溝通互動的基礎。換句話說，這個原本用來分析霸權概念的表格，也可以被轉而用來分析「感知結構」。不同的是，當用來分析霸權時，強調其結構宰制及自我再生產的面向；當用來分析「感知結構」時，強調的則是行動主體在結構中所具有的，突破既有限制的可能性。

Jones 將「感知結構」放在霸權體系中來理解，認為「即將浮現的感知結構」存在於霸權之意義與價值核心無法貫徹的邊陲，而正是這些部分是最容易產生變化的。既然會產生變化，所以即使是在單一結構中仍有其他可能性正在孕生，亦即包含了往另外一種霸權體系轉化的可能，而在任何另一種霸權明確浮現或穩固之前，必然經歷多種可能性之間的消長與競爭。所以一但將 Jones 的表格轉過來用之後，原本霸權概念所強調的單一結構所具有的統攝性，也隨之轉變為凸顯向不同方向轉化之可能性的「感知結構」的多樣性。因此本文才得以在分析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時，在同樣的霸權體系（中華文化霸權）之下，又分出

四種不同的感知結構（見下文）。

「感知結構」做為一種「結構」，我們可以對其進行不同層次的列表分析（如 Jones 所做），並找出其最明顯的特徵，但實際承載此些結構的個人所賴以行動或進行選擇的，乃是一個整體的、連續不斷、持續變動的經驗「感知」。但另一方面，這個代表整體「感知結構」表格的具體內容，雖必須根據個人的生命史來勾勒，而一旦被抽繹出來，這些「感知結構」就並非個人所獨有，而是可以對應入有共同脈絡的社會群體，例如吳濁流之於受日治教育的台籍智識分子，或曾虛白之於隨國府來台的部分外省智識分子。在這裡之所以使用「智識分子」（*educated people*）是爲了與具有特定含意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做區隔，用來泛指受過教育而有寫作或閱讀能力者（包括以日文），以呼應本文所欲探討的新聞媒體產製者與其讀者所共享的「感知結構」。

本文所選擇的四位報人典型中，相較於雷震與曾虛白是隨國府播遷來台（在國共鬥爭中都落入了敗部，但仍然繼續認同國民黨的文化霸權——雖然認同的程度與方式有別），吳濁流與李萬居的生命史，則與戰後的台灣一樣，先後都經歷了清楚的「霸權轉換」（由代表日本殖民者的「大和文化霸權」轉入代表戰後國府政權的「中華文化霸權」）。因此，在考慮生長於日治台灣的吳濁流與李萬居的「感知結構」樣態時，還必須兼及其所面對的此一轉換。根據 Jones 的分析架構，再加入兩位本土報人所經歷的霸權轉換因素，可以嚐試將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轉化為下面這四個表：

表二：吳濁流在兩個文化霸權中的「感知結構」解析表

（由「大和文化霸權」轉入「中華文化霸權」：時間點 1945——日本戰敗）

社會文化實踐位置	在霸權中的角色	具體情境
掌控的	同表一	大和文化霸權 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政治、社會、教育體制，積極引入西方現代化知識、技術，成為二十世紀初新崛起的帝國主義殖民強權，是進步優越的統治者。
	同表一	中華文化霸權 國府兩蔣政權承繼中國五千年文化，與國父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一脈相承，是唯一具有正當性的五族共和之中華民族的統治者。
殘餘的	同表一	大和文化霸權 承繼自家庭的傳統中國文化薰陶、氏族團體中的漢民族認同，以及客家族群生活風俗（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 9-10；褚昱志，2010，頁 47-48）。
	同表一	中華文化霸權 前殖民體制養成教育的日文讀、說、寫能力與藉由日文形成的世界觀與前殖民地智識份子的被歧視經驗（張良澤，1977，頁 6；戴國輝，1992，頁 339）。
浮現的	同表一	大和文化霸權 透過日治教育體系接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理解、欣賞大和文化的優美但對殖民統治差別待遇產生反省與自覺（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 33、37-38）。欲藉由回到中國人的社會來擺脫殖民體制（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 90-103）。
	同表一	中華文化霸權 對接替殖民者的祖國政府深感失望，以不參與政治、退出公共領域進行消極抵抗，轉進教育與文學領域繼續耕耘，創作兩本自傳為二二八寫歷史（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 6、205；吳濁流，1988，頁 33-34）。
即將浮現的	同表一	大和文化霸權 體認殖民地的台灣人，尤其是受日本教育的智識份子，既不是日本人，也不被中國社會視為中國人，逐漸蘊生出「亞細亞孤兒意識」（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 90-93；吳濁流，1977a）。
	同表一	中華文化霸權 從「亞細亞孤兒意識」轉而出現台灣主體思考，逐漸取代中華民族主義思考，取得與民主自由思想結合的優先順位。

表三：李萬居在兩個文化霸權中的「感知結構」解析表

（由「大和文化霸權」轉入「中華文化霸權」：時間點 1924——李萬居在此年前往上海求學）

社會文化實踐中的位置		在霸權中的角色		具體情境
掌控的	同表一	大和文化霸權	同表二	
		中華文化霸權	同表二	
殘餘的	同表一	大和文化霸權		由家族漢文私塾啓蒙，因家貧，具有社會經濟底層人民對以稅吏爲代表的統治者的消極抵抗心態（楊錦麟，1993，頁 11-14、18；楊瑞先，1968，頁 28-32、42）。
		中華文化霸權		到上海半工半讀，一開始只會台語、日語，不會說國語，得從ㄅㄆㄇㄋ學起，是個日本殖民地鄉下來的土包子（楊錦麟，1993，頁 22、29）。
浮現的	同表一	大和文化霸權		貧窮者的痛苦被連結於殖民者的壓迫，心中的民族主義火苗與「解救三百六十萬人」的理想結合。以一個無產孤兒，毅然回歸祖國（楊瑞先，1968，頁 42、51）。
		中華文化霸權		一心想讓台灣回到祖國懷抱，爲讓家鄉掙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投身祖國抗日大業（楊錦麟，1993，頁 106、111-112）。
即將浮現的	同表一	大和文化霸權		對貧窮、受壓迫者的同情，與對壓迫者的厭惡與反抗心理，讓他留法時選擇研究光譜偏左的無政府主義理論（楊錦麟，1993，頁 37）。
		中華文化霸權		留法的社會科學訓練奠定日後對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社會公益的堅持。與土地、鄉親的連繫讓他在二二八事件後選擇以「台灣認同」而非「國府認同」重疊於其一貫的「中國認同」上（楊錦麟，1993，頁 206、301-302）。

表四：雷震在文化霸權中的「感知結構」解析表

(時間點：1945 前後)

社會文化實踐位置	在霸權中的角色	具體情境
掌控的	同表一	同表二
殘餘的	同表一	生長於移民社群所養成對環境的敏感度、反省力與適應力（雷震，1989a，頁 98）。
浮現的	同表一	去日本留學，卻響應了留日學生罷學歸國運動。接受最重要知識訓練的日本，後來卻成為要全力對抗的侵略者。從青年時期就一直獻身的國民黨，卻必須對統治大陸失敗負責（雷震，1989a，頁 197；雷震，1989b，頁 8；雷震，1989c，頁 444）。
即將浮現的	同表一	憂心外省族群的處境，瞭解外省人要繼續生存必須融入台灣社會，國民黨要獲得政權正當性，必須將「中華民國」轉化成為「中華台灣民主國」，在台灣進行「土斷」（雷震，1989f，頁 74-79；林淇瀟，2003，頁 314）。

表五：曾虛白在文化霸權中的「感知結構」解析表

(時間點：1945 前後)

社會文化實踐位置	在霸權中的角色	具體情境
掌控的	同表一	同表二
殘餘的	同表一	地主階級士紳文化傳統（家鄉的影響），對家父長權威的尊敬與馴服（家庭、父親的影響）（曾虛白，1988，頁 7-92、168）。
浮現的	同表一	很早接觸西方思潮，對舊式大家庭、官場陋習進行反省（從其自傳、文學作品中看到）。感受到自由報業對社會的影響力（辦報經驗）。認為救國高於辦報，投入對日民族保衛戰（曾虛白，1988，頁 110-154）。
即將浮現的	同表一	在廣泛接觸西方事物後，開始抱著某種不信任態度（對膚淺的留洋者、張狂的外國記者、愚昧的左派都無好感），傾向回歸偉大的父親、英明的領袖及其思想（三民主義）、博大精深的傳統中華文化（曾虛白，1982；曾虛白，1992a）。

從上面四個表中可以發現，相較於具掌控位置的霸權核心的相對固定（不論是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所欲貫徹的「大和文化霸權」，或戰後國府所欲貫徹的「中華文化霸權」），四位報人在「殘餘的」、「浮現的」以及「即將浮現的」感知結構部份則是呈現出明顯的殊異性。爲了比較的方便，必須將以上四個表加以合併，但由於李萬居、吳濁流兩人的「感知結構」比較表包括了「大和文化霸權」與「中華文化霸權」的轉換，與雷震、曾虛白的結構表並不一致，因此必須再進一步整合。而整合的策略將會牽涉到以下的概念：不論霸權轉換的時間點是 1924（李萬居赴上海讀書）還是 1945（二戰結束、台灣復歸中國），霸權典範雖經歷了大轉移，但對李萬居與吳濁流來說，時間是延續的。也就是說，做爲一個歷史的行動者，殖民地青年李萬居從台灣到了上海，昨天還是一個日本皇民，今天就變成了祖國的兒女，但他還是同一個李萬居，他的思想、行爲、「感知結構」並不會一夕改變，所以雖然在以霸權爲參照的表三中，必須將「大和文化霸權」與「中華文化霸權」兩個霸權做概念上的區分，但當作用在個人身上時，與兩個霸權互爲參照的兩組「感知結構」，卻是同時作用在歷史行動者身上的。而當後來的霸權取代了過去的霸權，以過去霸權爲參照的「感知結構」仍然會延續成爲新的「感知結構」的一部分。

霸權的建立或轉移並不是一夕之間完成的，往往必須經過一個複雜、耗時的過程。日治五十年，也只在台灣建立「弱勢霸權」（方孝謙，2007），這點也支持以前後不同霸權爲參照的「感知結構」，可以層疊累積。基於以上理解，對吳濁流、李萬居而言，當從「大和文化霸權」進入「中華文化霸權」時，原來與「大和文化霸權」參照的一組「感知結構」並不會消失（當然可能會更後退或更隱約一些），而是融入新形成的另一「感知結構」中。因此，將吳濁流、李萬居兩人的「感

知結構」解析表中與不同霸權參照所得出的兩組概念加以整併，就不會顯得不合理了。而這種整併一方面也顯示，對經歷殖民經驗的吳、李兩人而言，包含在其「感知結構」中的元素，較諸大陸來台的雷震、曾虛白更為複雜。經過以上詮釋，將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並列，我們可以得出下面這個表

表六：四位報人參照「中華文化霸權」的「感知結構」比較表
(灰底區域為從參照「大和文化霸權」的「感知結構」解析中所接續過來的部份)

報人	殘餘的	浮現的	即將浮現的
吳濁流	承繼自家庭的傳統中國文化薰陶、氏族團體中的漢民族認同，以及客家族群生活風俗。前殖民體制養成教育的日文讀、說、寫能力與藉由日文形成的世界觀與前殖民地智識份子的被歧視經驗。	透過日治教育體系接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理解、欣賞大和文化的優美但對殖民統治差別待遇產生反省與自覺。欲藉由回到中國人的社會來擺脫殖民體制。對接替殖民者的祖國政府深感失望，以不參與政治、退出公共領域進行消極抵抗，轉進教育與文學領域繼續耕耘，創作兩本自傳為二二八寫歷史。	體認殖民地的台灣人，尤其是受日本教育的智識份子，既不是日本人，也不被中國社會視為中國人，逐漸蘊生出「亞細亞孤兒意識」。「亞細亞孤兒意識」轉而出現台灣主體思考，逐漸取代中華民族主義思考，取得與民主自由思想結合的優先順位。
李萬居	由家族漢文私塾啟蒙，因為家貧，具有社會經濟底層人民對以稅吏為代表的統治者的消極抵	貧窮者的痛苦被連結於殖民者的壓迫，心中的民族主義火苗與「解救三百六十萬人」的理想	對貧窮、受壓迫者的同情，與對壓迫者的厭惡與反抗心理，讓他留法時選擇研究光譜偏左的

報人	殘餘的	浮現的	即將浮現的
	抗心態。 到上海半工半讀，一開 始只會台語、日語，不 會說國語，得從ㄅㄆㄇ ㄋ學起，是個日本殖民 地鄉下來的土包子。	結合。以一個無產孤兒 ，毅然回歸祖國。 一心想讓台灣回到祖國 懷抱，為讓家鄉掙脫日 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 投身祖國抗日大業。	無政府主義理論。 留法的社會科學訓練奠 定日後對政治民主、言 論自由、社會公益的堅 持。與土地、鄉親的連 繫讓他在二二八事件後 選擇以「台灣認同」而 非「國府認同」重疊於 其一貫的「中國認同」 上。
雷震	生長於移民社群所養成 對環境的敏感度、反省 力與適應力。	去日本留學，卻響應了 留日學生罷學歸國運動 。接受最重要知識訓練 的日本，後來卻成為要 全力對抗的侵略者。從 青年時期就一直獻身的 國民黨，卻必須對統治 大陸失敗負責。	憂心外省族群的處境， 瞭解外省人要繼續生存 必須融入台灣社會，國 民黨要獲得政權正當性 ，必須將「中華民國」 轉化成為「中華台灣民 主國」，在台灣進行「 土斷」。
曾虛白	地主階級士紳文化傳統 （家鄉的影響），對家 父長權威的尊敬與馴服 （家庭、父親的影響） 。	很早接觸西方思潮，對 舊式大家庭、官場陋習 進行反省（從其自傳、 文學作品中看到）。感 受到自由報業對社會的 影響力（辦報經驗）。 認為救國高於辦報，投 入對日民族保衛戰。	在廣泛接觸西方事物後 ，開始抱著某種不信任 態度（對膚淺的留洋者 、張狂的外國記者、愚 昧的左派都無好感）， 傾向回歸偉大的父親形 象、英明的領袖及其思 想（三民主義）、博大 精深的傳統中華文化。

伍、「感知結構」與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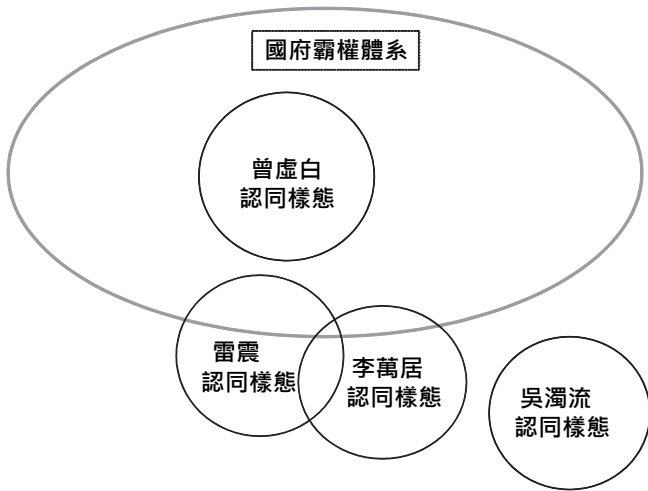
以上四個表格的內容，是從大量閱讀四位報人的自傳、傳記、以及相關所整理、歸納出來的，雖不免經由作者解讀，但在取材上多遵循優先採用第一手材料的歷史研究基本原則，是目前所能掌握到的，四位報人生命史過程的具體內容。也是將藉以還原其「感知結構」的基礎。

從表六中我們可以看出，曾虛白與雷震雖都是大陸來台報人，但他們所承載的感知結構卻並不相同。如同 Williams 在《邊境之鄉》（*Border Country*）中所描述，偏鄉青年前往都市求學，面臨跨越不同社會「感知結構」的經歷（Williams, 1962）。同樣生長於廣袤中國大陸，政治上又都參與了國民黨，但曾、雷二人的「感知結構」內容，卻呈現出相當程度的差異；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同樣生長於日本殖民地台灣的李萬居與吳濁流身上，顯示不同的家庭社經條件與早年經歷，影響了個人後來的出處抉擇。從四位報人命運的開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行動主體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的靜態結構」，但「行動者的對環境進行回應的能動性，又讓歷史發展蘊含結構內部的可變動性」（參見本文「貳」中對之所以選擇「感知結構」作為參考架構之說明的第3點）。

本文「貳」中也曾經提到，許多關於台灣社會文化議題的研究，都以「認同」作為概念樞紐，但本文卻認為，「研究台灣認同樣態做為不同社會群體間的一種異質性，本身就有待解釋，因此必須再上溯這些不同認同樣態之所從來。」經由表六對四位報人「感知結構」的呈現，我們可以從中推衍出其個別之認同樣態（尤其是從「即將浮現」一欄中的黑體字部分），以及其彼此間的關係，呈現如下圖：

圖一：四位報人的認同樣態示意圖

四位報人的認同樣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我們在表六曾虛白「感知結構」的「即將浮現」欄黑體字中所看到的描述是「回歸偉大的父親形象、英明的領袖及其思想（三民主義）、博大精深的傳統中華文化。」對戰後的台灣而言，國府即是霸權的代表與執行者，曾虛白處在統治集團核心位置，不但負責鞏固這個霸權體系，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創造了霸權的相關論述（長時間領導「中央社」），其所生產的相關論述，本身就是被認同的對象，從圖一中我們可以看出，曾虛白的認同樣態與國府霸權基本上已合而為一；雷震「感知結構」在表六中同一位置的黑體字描述則是「國民黨要獲得政權正當性，必須將『中華民國』轉化成為『中華台灣民主國』，在台灣進行『土斷』。」顯示他的認同樣態已經從過去的國府政權核心位置，移向邊陲，與「在二二八事件後選擇以『台灣認同』而非『國府認同』重疊於其一貫的『中國認同』上」的李萬居一樣，都懸在霸權體系認同

的邊緣上，彼此因此產生了不少相近之處。而吳濁流的「感知結構」中「即將浮現」欄的這個部份，是關於從「『亞細亞孤兒意識』轉而出現台灣主體思考，逐漸取代中華民族主義思考，取得與民主自由思想結合的優先順位。」可以說完全是國府霸權體系的化外之民。

基於認同樣態的主要內容，我們還可以將其再細分為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後，整理出下面這個表：

表七：四位報人的認同樣態比較表

認同層次	曾虛白	雷震	李萬居	吳濁流
國家認同	代表中華文化正統之國府	實施民主納入本土政治精英的外省合法政權	實施民主納入本土政治精英的外省合法政權	「復中興」意識→亞細亞孤兒意識→台灣主體意識
民族認同	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 ⁸	漢民族+浙江的河南移民	漢民族+台灣福佬人	漢民族+台灣客家人
文化認同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孫蔣」一系的正統中華文化傳統	多元的中華文化傳統（河南中原文化、浙江南方文化）	台灣文化傳統+中華文化傳統	台灣的客家文化傳統+大和文化+中華文化傳統
普世價值認同	政治權威=威嚴慈愛的家長、父兄=政治先知先覺者	言論自由、民主人權為普世價值，輿論可以帶來政治民主 ⁹	言論自由、民主人權、對被壓迫者的解放為普世價值	歷史之流永不停滯，存著這樣的希望持續寫作，留待日後發表（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227）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整理。

在表七中，我們可以看到，四位報人在「民族認同」上的歧異並不大，不論是浙江的河南移民（雷震）、台灣福佬人（李萬居）、台灣客家人（吳濁流），都包含在「漢民族」這個大範圍下，即使是在國家統一之意識形態下所強調的「中華民族」（曾虛白），也還是以「漢民族」為隱性前提的。但在「國家認同」部分，則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其中，吳濁流從「亞細亞孤兒意識」所衍伸出的台灣主體意識，與曾虛白所強調的「大中國」背道而馳；與雷震及李萬居強調以民主程序重新建立政權合法性的主張，在應該將政治權力重新分配上，則可以產生相當重疊。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文化認同」部分。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我們在吳濁流身上至少還可以發現其對漢文化（中華文化），及母語客家文化的浸潤與認同；而雷震及李萬居在對較大範圍、較抽象的「中華文化」的認同之外，也都意識到此「中華文化」之下，還有與生活經驗息息相關，並為個人情感記憶所繫的多元區域文化的重要性。雷震曾經在自傳中提到一段讓他印象深刻的童年往事，描述他浙江籍的母親，如何被父系河南籍親族無理的歧視，母親身受的痛苦，讓他在尊重多元上獲得啓蒙（雷震，1989a，頁 98）。雖然很早就西渡大陸，並毫不猶疑地擁抱中華文化，但李萬居對故鄉台灣卻一直抱有特殊情感，在台灣省議會問政時，還首創以台語問政先例（楊錦麟，1993，頁 240）。從雷、李兩人的相關言行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心中所謂的「中華文化」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有其內部的豐富與多元性的。相較之下，曾虛白則強調「中華文化」人為創造的「道統」面相，傾向把「文化認同」（中華文化「正統」）與「國家認同」（代表此文化「正統」的國府）進行連結。

而從表七中，也可以再次印證前面所提到過的：雷震與李萬居兩人

在各個層次的認同上顯然最爲接近（參見表七中加灰色網底部分），而與同樣是隨國府來台的曾虛白差異反而明顯。這些從不同「感知結構」所衍生出的認同樣態，有些顯然不爲其當代的宰制霸權所認可，但在歷史流變中經歷起伏消長之後，其中的許多重要質素卻始終沒有消失，在1988年台灣報禁正式解除後，又全部重新展現於報業（新聞媒體）舞台，成爲理解當前台灣新聞媒體之所以呈現各據國家認同光譜兩端現象的要重線索與源頭。

上面從對四位報人「感知結構」的比較中（表六），勾勒出其對戰後初期國府霸權體系的認同樣態（圖一），並進一步將認同做出「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等層次區分（表七）。接下來就要討論，這些源自不同「感知結構」的多層次認同樣態，究竟如何實際影響了四位報人們在戰後初期台灣社會中的具體實踐，又如何經過一度沉潛後，再度浮上了歷史發展的檯面。

爲了更具體說明這種多重「感知結構」導致不同認同樣態的場景，如何呈現於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策略上可透過比較四位報人見諸目前記錄的，對當時主要時事的看法與態度來加以凸顯。在這裡分別選擇他們對「國府政權」、「反攻大陸」、「地方選舉」，以及對「言論自由」與「記者、報人角色的看法」這五個方面的觀點與主張來進行對照。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除了目前所看得到的資料中，在這幾方面還算差堪對照，主要也是因爲其中「國府政權」、「反攻大陸」、「地方選舉」這幾部分，關乎對當時統治權力正當性的評價，事關國家認同；而「言論自由」、「記者、報人角色的看法」則是事關報人、記者對本身新聞專業義理的認知。依照目前所蒐集的相關資料，我們可以整理出下面的表八：

表八：四位報人對時事的看法與態度對照表

對時事 的看法	曾虛白	雷震	李萬居	吳濁流
對國府 政權的 看法與 態度	唯一承繼中華 民國法統的中 國合法政權。	國府領導者必須 檢討大陸失敗原 因，改造為一個 符合自由民主價 值、與台灣社會 連結的合法政 權。	國府必須在台灣 落實民主人權。	政府不用本省人 的心態猶如外來 殖民政府（吳濁 流／鍾肇政譯， 1987，頁 141- 142）；「獨裁無 能、民主無望」 （吳濁流／鍾肇 政譯，1987，頁 238）。
對反攻 大陸	不論新聞、文 藝，一切都必 須在反攻的前 提與需求下思 考（曾虛白， 1992b、1992c ）。	反攻是長期目標 ，不可只做短期 的打算，以權宜 思考治理台灣， 剝奪人民權利（ 雷震，1989d， 頁 10）。	不應工具性的將 台灣當成反攻基 地，忽視台灣人 民的基本權利； 遺憾此生無法再 去大陸（楊瑞先 ，1968，頁 129 ）。	體會到反攻大陸 已成為國府剝奪 人權的理由：何 時解除戒嚴？大 概要等到反攻大 陸吧（吳濁流／ 鍾肇政譯，1987 ，頁 221）！
對台灣 的地方 選舉	曾親自南下協 調嘉義、雲林 等地方縣長人 選。認為國民 黨推薦候選人 ，是為人民解 決不知該選誰 的困難（曾虛 白，1990a， 頁 527-535） 。	1957 年《自由 中國》開始討論 地方自治問題， 並參加黨外人士 召開的地方選舉 檢討會議（楊錦 麟，1993，頁 284）。	1957 年針對國 民黨包辦選舉， 與地方在野反對 人士組「選舉檢 討座談會」，並 籌組「中國地方 自治研究會」（ 楊錦麟，頁 284- 285）。	選舉造成本省人 內部派系分裂（ 吳濁流／鍾肇政 譯，1987，頁 218）；候選人 幾乎都是國民黨 員，無黨派者即 使當選也是大河 一粟，憲法未被 落實前決不投票 （吳濁流／鍾肇 政譯，1987，頁 205）。

對時事的看法	曾虛白	雷震	李萬居	吳濁流
對言論自由	在三民主義反共復國國策下的新聞自由，提倡「三民主義新聞政策」（曾虛白，1977、1982）。	言論自由是民主國家基本人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辦《自由中國》。	言論自由是民主國家基本人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辦《公論報》。	冒著「不要命」的危險寫小說（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227），紀錄歷史的文字當時雖如「無花果」，但終能如「台灣連翹」遍樹開花。
對記者、報人角色看法	記者是協助「先知先覺者」（執政者）教育「不知不覺者」（民眾）的後知後覺者（曾虛白，1982，頁153-155）。	唯有在野輿論才能時時提醒政府不陷於忘我之境（雷震，1989d，頁36-38）；台灣新聞界能說真話的新聞媒體少之又少（雷震，1989d，頁87）。	辦報是一種社會服務，一種犧牲，不應該以賺錢為目的（楊瑞先，1968，頁111）。	記者應該以社會木鐸自許，揭發不義、打擊公器私用（吳濁流／鍾肇政譯，1987，頁140）。

從表八中我們再次發現，同樣是隨國府來台的曾虛白與雷震，對核心的「反攻大陸」議題，論點卻有很大的差異。雷震在體察到反攻並非短期內可能實現後，改主張民主務實路線，希望國府能好好經營「自由中國」台灣，1950 年開始，《自由中國》上就開始陸續出現這類的論點，後來被官方的言論檢查者總結為所謂的「反攻無望論」；約莫在同一個時期，曾虛白則是站在另一邊，鼓吹一切均需以反攻為前提。他強調，新聞界必須隨時準備反攻大陸：

我們雖不能確實斷定下一年度就會發動反攻，可是反攻的機會隨時會出人意外地突然來臨的。假定，機會來了，我們怎樣配合軍事的推進，目前新聞界還沒有一點準備。……我們可有接收大陸上一千七百多家報紙的人才？……我們可曾擬妥了肅清奸匪敗退之後地下活動的計畫？……可有配合軍事推進，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的組織。……可有在敵人焦土政策大破壞後，重振全國新聞事業的配備？至於軍事底定之後，如何確定我們民主自由的新聞政策……我們今天都沒有理出一些頭緒來（曾虛白，1992d，頁 555-556）。

他對反攻大陸的樂觀態度，至少一直持續到 1981 年（87 歲）出版《擊楫中流集》時，他在該書〈自序〉中寫道：「期援渡江祖逖擊楫誓言『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之先例，重申我八七高齡，必能在我有生之年追隨討賊國軍重履大陸的信心！」（曾虛白，1981）這個「存乎一心」的論點，對照於 1957 年 8 月 1 日出刊的《自由中國》第十七卷第三期，「今日問題」社論系列中的〈反攻大陸問題〉一文所主張的「訴諸公算」，可以看出之間的落差，後者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顯然已超過對特定政權的效忠：

自由中國的全體，尤其是來自大陸的人，誰不想反攻大陸？……這幾年來在台灣的措施都是以「馬上就要回大陸」為基本假定。這種辦法，真是弊害橫生。……形成事事「暫時忍受」和「暫時遷就」的心理狀態。大家看到官方許多不合理或煩苛無比的措施，都認為這是暫時的現象，將來回到大陸就好了，所以只有忍受下去。

當然，若以媒體的普及性來說，擁有大批電波頻率的中廣，聽眾群遠較《自由中國》的讀者來得更多、更廣。曾虛白也因為長期（連續二

十年）主持「談天下事」這個廣播節目，而成為一個知名人物。但在當時輿論生態中，依然存在《自由中國》這種非主流的刺耳「雜音」，呈現一種「感知結構」多重奏的狀況。這多重奏夾雜陣陣尖銳批判的高音，聽起來並不和諧。隨著《自由中國》（1960）與《公論報》（1962）先後停刊，這多重奏中的刺耳高音也因後繼無力不得不嘎然而止，終於沈寂於歷史的舞台。

而在對記者與報人之社會角色的認知上面，四位報人中，除了曾虛白將記者定位在與統治者協同合作的角色上（協助諸葛亮教育阿斗），其他三位，不論是 1960 年之前還活躍於台灣報業舞台的雷震、李萬居，還是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就已經在外表上（而非心境上）退出新聞圈的吳濁流，對於記者應該針貶時弊、對抗權威，扮演社會木鐸、人民喉舌的自我角色認知，可以說相當一致。如同上一段所提到，這種報人的自我角色認知，也一度連同對統治者的各種異議「雜音」遭霸權打壓，被迫沉默或被邊緣化於歷史舞台，成為有待恢復與重建的歷史遺產。

陸、結語——伏筆與線索

本文之所以花費篇幅著墨於四位報人生命史，係基於歷史研究不能不基於史料而直接從概念建構或定義入手的認知（即使社會科學研究也必須從歷史中汲取形成概念的養分），所以雖然我所要進行的是進行台灣戰後報人的「感知結構」類型建構，但仍必須經由個別具體人物入手，透過史料與概念雛形的對話辯證，逐漸確立分類概念的適切性，而史料的豐瘠與多寡，也不可避免的會影響對人物的選擇。但在確立分類架構，並針對類型做出若干概念抽繹之後，這些類別就不只適用於單一

個人，而是適用於與其遭遇類似的一群人。有些人在歷史上仍留有名姓，有些人則已不見諸史載，研究者既無法提及其姓名，只能以某一類別向其致意。

從乙未（1895）割台到戰後國府遷台（1949）後約十年的時間（以《自由中國》1960 年停刊為界限），台灣社會在短短六十幾年間，經歷了劇烈的變化，其層層堆疊、異質雜陳的生命經驗與集體記憶，透過對個體的影響形構出了特殊的群體特性。在本研究所選擇的四位報人中，我們從吳濁流身上可以完整看到這層層堆疊的記憶與認同掙扎所留下的痕跡，他雖然在二二八事件後就退出了新聞界，但始終提示著台灣社會中那些被壓抑在底層的潛在質素與力量；李萬居與雷震，一個是本省報人、一個是外省報人，一個是青年黨人、一個是老國民黨，但兩個人卻在民主、自由信念下，以抽象的普世價值認同，在言論與作為中，顯現出某種超越地域、黨派，甚至可能已經超越至今紛擾的「統獨」問題的格局。

曾式「感知結構」透過其長期主導國民黨黨營媒體與傳播教育機構發展方向而發揮了深遠的影響。他以「新聞記者是為先知先覺者（國家領導人）教育、喚起後知後覺者（一般民眾）的橋樑」做為對記者角色的詮釋，在相當一段時間中支配了台灣傳播學術界產製知識觀點的方向。傳播學者林麗雲即指出，台灣在 1950 年代中期到 1960 年代，政治場域邏輯凌駕傳播學術場域邏輯，記者站在協助統治者一邊的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 1980 年代末期解嚴之後，甚至到今日，這類心態依舊持續發揮著影響力（林麗雲，2004，頁 119）。

但另一方面，在 1949 年國府遷台後，由《自由中國》所一度撐開的在野論政場域，在 1960 年雷案後雖一度頓挫，但其所生產的一批言論資產，仍繼續在台灣社會各個角落默默發揮著影響力（邱家宜，

2011，頁 121-123），而雷式「感知結構」也沉潛蛰伏，等待下一個再度浮現的時機。1975 年《台灣政論》出刊，象徵重振在野政論場域的先聲，出版《台灣政論》的張俊宏、黃華曾特別將雜誌創刊號送去給當時已經「刑滿」出獄的雷震（陳菊，1989，頁 273）；出版《八十年代》（1979）系列雜誌的康寧祥，則是雷震當年組黨陣營中的小將；而辦《前進》（1983）雜誌的林正杰，從大學時代就偷偷地看《自由中國》（林正杰，1989，頁 170）。如果把從 1970 年代中期開始，做為日後台灣政治民主化先聲的「黨外雜誌」發行運動，視為是《自由中國》當年所開啓之在野政論場域的復興與轉型，應屬公允之論。而雷式「感知結構」也在這樣的復興與轉型中，再度浮出於台灣社會。

除了《自由中國》這個歷史資產，李萬居辦《公論報》的事蹟，也是 1970 年代中期以後，為對抗國府霸權而掀起黨外雜誌風潮的這批言論界後起之秀心目中的另一個典範。後來多次參與黨外雜誌陣容的黃順興，當年曾經負責《公論報》在台東的發行業務。他曾提到自己當年之所以接辦公論，完全是受了李萬居的感召（黃順興，1981）。《公論報》所展現的凸顯在野性格的本土報業精神，在《公論報》走入歷史後，仍由強調無黨無派的《自立晚報》所延續。

其實《自立晚報》創報比《公論報》還早兩個多月，但期間數度易主經營，剛開始的經營者顧培根（顧培根先生治喪委員會，1984）、鄭邦琨、婁子匡等人都是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人士。1951 年 9 月開始由李玉階主持報社，擺脫立場曖昧渾沌的舊觀，一改而為自由言論的急先鋒（陳國祥、祝萍，1987，頁 83）。在 1950 年代，李玉階曾是當時「民營報業聯誼會」要角，帶領同業為當時經營相當困難的台灣報紙同業，向官方爭取刊登政府各項公告的權利（呂東熹，2010，頁 318-323）。《自立晚報》言論雖不像《公論報》那樣激烈挑戰當局的言論

尺度，但也被列在「不聽話」的名單中，並曾經三度遭停刊處分。如同其他敢言的新聞媒體，在當時的台灣社會總是很快就經營不下去，《自立晚報》的財務日趨困窘，1959 年夏天，原本與國府高層頗有淵源的社長李玉階，正式邀請著名的黨外人士吳三連投資，共同加入經營《自立晚報》（呂東熹，2010，頁 328）。

當時吳三連正與雷震、李萬居等人積極發起跨地域、跨黨派的籌組新黨運動（吳三連，1991；楊錦麟，1993），從某些方面看來，吳三連、李玉階的合作，與李萬居、雷震的合作異曲同工，都是本土政治精英與大陸來台自由派智識份子的合流。國府方面為免「重蹈覆轍」，乃多方阻梗。一番波折後，無黨籍的吳三連和執政黨的許金德同時加入自立晚報行列，與李玉階共同經營自立晚報，形成三方合作局面。並由當時台灣省報業管理單位省政府協調國民黨籍的葉明勳出任社長。1965 年李玉階退出後，形成吳、許共同經營，而以吳三連為主導的局面（陳國祥、祝萍，1987，頁 84）。

吳三連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運動之子，也是戰後台灣本土智識份子中最具有新聞專業的人士之一，但卻因為戰後轉而經商、從政，幸而避過二二八與 1950 年代對媒體的大整肅，並以自己的資歷、聲望與才幹累積了相當的經濟與社會資本。1959 年他在雷震、李萬居即將被迫走下報業舞台前夕，又因緣際會的加入了《自立晚報》，直到 1988 年報禁解除前，該報都扮演著維繫台灣新聞媒體在野精神與本土性格之一柱香火的角色。

李玉階與吳三連並非本文主要的分析對象，但如同前面已經提到，不論是曾（虛白）式「感知結構」、雷（震）式「感知結構」、李（萬居）式「感知結構」或吳（濁流）式「感知結構」，「感知結構」概念所指涉的，並不只是單獨的個人，而是個人所長成並行為於其中的社會

文化環境。同為隨國府來台的大陸智識份子，雷式「感知結構」可能相當程度適用於李玉階；而日治時期的成長背景，也可能使得吳三連與吳濁流具有相類似的「感知結構」。於是我們看到代表日治時期台灣社會智識份子的吳式「感知結構」的線索，在 1947 年的隱沒後，又再度透過吳三連的加入《自立晚報》，一點一點的浮出於台灣報業舞台，等待 1975 年「黨外雜誌」運動風潮所夾帶的李式「感知結構」與雷式「感知結構」因子的加入，匯聚為日後台灣報業場域蓬勃開展的前沿。

註 釋

- 1 「類型」在這裡的用法，與韋伯的「ideal type」不盡相同。韋伯的用法，是概念抽繹的工具性分類（例如：傳統型支配、法制型支配、卡里斯瑪支配）（Roth & Wittich eds, 1978／康樂編譯，1985，頁 25-30），本文的類型則是依據人物原生環境及生命經歷來做區分，目的在凸顯讓類別浮現的那些歷史因素與過程，所依據的是 Williams 所謂的「原生結構主義」（genetic structuralism）原則，引述 Williams 原文如下：「…無關乎內容，而關乎心理結構（mental structure）：一種讓特定社會群體得以同時組織現實意識，並以寫作創造出想像世界的範疇。依據定義，這些結構並非單獨而是被集體創造出來的。這個幾乎難以轉譯的『原生結構主義』，難以用特定詞彙表達，因為其不僅關乎結構分析，而且關乎其歷史性的形成與過程：因為其改變方式就是其形成方式。此種取徑相信，所有人類行為均為對特定客觀情境進行重要回應。是誰在做回應？…既非個人也非任何抽象群體，而是在真實集體社會關係下的許多個人。」（William, 2005, pp. 22-23）。
- 2 本文採用馮建三譯筆（Williams, 1994／馮建三譯，2002），而非一般慣用的「感覺結構」，係因「感覺」在中文裏較常用於直覺、非知性活動，衡諸 Williams 使用此詞彙的前後脈絡，用「感知」或許更貼切。
- 3 關於四位報人較詳細的生平經歷與思想，可參見《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邱家宜，2011，頁 29-145），限於篇幅，本文僅作扼要介紹。
- 4 與吳濁流同屬台灣本地報人的，還包括林呈祿（1886-1968）、葉榮鐘（1900-1978）、吳三連（1899-1988）、黃旺成（1888-1978）等（邱家宜，2011，頁

- 44-47)。關於吳濁流的生平與思想，本文主要根據他的兩本自傳體小說《無花果》（1988）、《台灣連翹》（1987），以及張良澤所編的《吳濁流作品集》1-6 冊（1977）。
- 5 關於李萬居的生平與思想，本文主要根據楊錦麟的《李萬居評傳》（1993），以及李萬居妻子鍾賢靜之弟媳楊瑞先為他寫的傳記《珠沉滄海》（1968）。
 - 6 關於雷震的生平與思想，本文主要根據傅正所編的《雷震全集》（1989）中的《我的母親》（第 8 冊）、《我的學生時代》（第 9、10 冊）、《雷震與自由中國》（第 13 冊）、《雷震與政黨政治》（第 14 冊）。
 - 7 關於曾虛白的生平與思想，本文主要根據他的自傳（上冊 1988，中、下冊 1990），以及《曾虛白自選集》（1981）、《迎曦集》（1982）、《談天下事》（1992）。
 - 8 本表格中分別使用「中華民族」與「漢民族」兩個不同的名詞，前者係強調其人為建構性質，後者則是相對於其他少數民族的敘述。
 - 9 林淇養指出：「雷震對《自由中國》抱有一般政客難以想像的認真和誠摯，這與他相信輿論可以帶來政治民主有關。」（林淇養，2003，頁 111）

參考書目

- 卜幼夫（1962）。《台灣風雲人物》。香港：新聞天地社。
- 中國人民大學港澳台新聞研究所（編）（1998）。《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新華。
- 〈反攻大陸問題〉（1957 年 8 月）。「今日問題」社論系列，《自由中國》，17(3): 5-7。
- 方孝謙（2007）。《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台北：巨流。
-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
- 吳三連（1991）。《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
- 吳純嘉（1999）。《人民導報研究（1946~1947）兼論其反應出的戰後初期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變遷》。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濁流（1977a）。《亞細亞的孤兒》，張良澤（編），《吳濁流作品集 1》。台北：遠行。
- 吳濁流（1977b）。〈瘡疤集（上卷）自序〉，《台灣文藝與我》，張良澤（編），《吳濁流作品集 6》，頁 187-191。台北：遠行。
- 吳濁流（1988）。《無花果》。台北：前衛。

- 呂東熹（2010）。《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台北：玉山社。
- 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台北：自立晚報。
- 李筱峰（1996）。〈從《民報》看戰後初期台灣的政經與社會〉，《台灣史料研究》，第八號，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 林正杰（1989）。〈以民進黨的成立紀念雷震先生〉，《雷震全集 1—雷震與我（一）》。台北：桂冠。
- 林淇養（2003）。《意識形態、媒介與權力：「自由中國」與五〇年代台灣政治變遷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麗雲（2004）。《台灣傳播研究史》。台北：巨流。
- 邱家宜（2011）。《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施正鋒（2000）。《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
- 康樂（編譯）（1985）。《韋伯選集Ⅲ：支配的類型》。台北：允晨。（原書[譯自英譯本]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eds.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part 1, ch. II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張良澤（1977）。〈「吳濁流作品集」總序〉，《吳濁流作品集》，頁 1-33。台北：遠行。
- 張煦本（1982）。《記者生涯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陳菊（1989）。〈萬山不許一溪奔〉，《雷震全集 2—雷震與我（二）》。台北：桂冠。
- 陳國祥、祝萍（1987）。《台灣報業演進 40 年》。台北：自立晚報。
- 曾虛白（1977）。〈我們要有自己的新聞政策〉，《檻外人言》，頁 120-136。台北：幼獅。
- 曾虛白（1981）。〈自序〉，《擊楫中流集》，頁 1-2。台北：時報。
- 曾虛白（1982）。〈申論三民主義新聞政策〉，《迎曦集》，頁 150-156。台北：時報。
- 曾虛白（1988）。《曾虛白自傳》（上）。台北：聯經。
- 曾虛白（1990a）。《曾虛白自傳》（中）。台北：聯經。
- 曾虛白（1990b）。《曾虛白自傳》（下）。台北：聯經。
- 曾虛白（1992a）。〈出賣中國的市儈記者群〉，《談天下事》，頁 146-158。台北：正中。
- 曾虛白（1992b）。〈我們要戰鬥文藝〉，《談天下事》，頁 543-546。台北：正中。
- 曾虛白（1992c）。〈繼承五四精神我們要武裝文藝〉，《談天下事》，頁 547-551。台北：正中。

- 曾虛白 (1992d[1952])。〈記者節開幕辭〉，《談天下事》，頁 552-556。台北：正中。
- 黃順興 (1981)。〈憶萬居先生〉，《永懷李萬居先生—記一位民主自由先知先覺者》，雲林：甘地出版社。
- 楊瑞先 (曼池) (1968)。《珠沈滄海》，沈雲龍 (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八十一輯 0809)。台北：文海。馮建三譯 (2002)。《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台北：遠流。(原書 Williams, R. [199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UK: Fontana.)
- 楊肇嘉 (1967)。〈台灣新民報小史〉，《楊肇嘉回憶錄 (二)》，頁 407-440。台北：三民。
- 楊錦麟 (1993)。《李萬居評傳》。台北：人間。
- 葉明勳 (1995)。《感懷集》。台北：躍昇。
- 葉榮鐘 (1983)。〈明智的領導者林獻堂先生〉，原載《大學雜誌》100 期，收入陳永興、李筱峰 (編) (1983)，《台灣近代人物集—近代台灣知識份子的志業與理想》，頁 18-26。李筱峰自印。
- 雷震 (1989a)。《雷震全集 8—我的母親》。台北：桂冠。
- 雷震 (1989b)。《雷震全集 9—我的學生時代 (一)》。台北：桂冠。
- 雷震 (1989c)。《雷震全集 10—我的學生時代 (二)》。台北：桂冠。
- 雷震 (1989d)。《雷震全集 13—雷震與自由中國》。台北：桂冠。
- 雷震 (1989e)。《雷震全集 14—雷震與政黨政治》。台北：桂冠。
- 雷震 (1989f)。《雷震全集 27—給蔣氏父子的建議與抗議》，台北：桂冠。
- 褚昱志 (2010)。《吳濁流及其小說之研究》。台北：秀威。
- 戴國輝 (1992)。《愛憎二·二八》。台北：遠流。
- 薛心鎔 (2003)。《編輯台上：三十年代以來新聞工作剪影》。台北：聯經。
- 謝東閔 (1988)。《歸返—我家和我的故事》。台北：聯經。
- 鍾肇政譯 (1987)。《台灣連翹》。年代文庫。(原書：吳濁流著。)
- 顧培根先生治喪委員會 (1984)。〈顧公培根先生行誼〉。
- Carey, J. W. (1997[1974]).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 In E. Stryker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86-94).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oldmann. In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Selected essays* (pp. 11-30). New York, NY: Verso.
- Gramsci, A. (1995). *Antonio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D. Boothman, tran and ed). London, UK: Lawrence & Wishart.
- Jones, P. (2004). 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ichele, L. D. (1993). Autobiography and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border country. In D. Dworkin & L. G. Roman, (Eds.), *Views beyond the border country*. London, UK: Routledge.
- O'Connor, A. (1989).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 Oxford, UK: Blackwell.
- Williams, R. (1962). *Border country*. New York, NY: Horizon Press.
- Williams, R. (1975[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Fontana.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 (2005[1980]). Literature and sociology: In memory of Lucien

The Multiple “Structures of feeling” of Taiwan Newspapermen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Eve Chiu*

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a major cause of domestic tension in Taiwanese society. The news media's divided opinions on the issues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tear society apart. For a sensibl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we must look back to the post-war period in Taiwan to identify the roots of these various identities. This paper chooses four newspaper journalists: Wu Cho-liu, Li Wan-ju, Lei Zhen, and Zeng Xu-bai, and analyzes their individual “structures of feeling” as th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distinct identities. No matter the keeping working Zhen type “structure of feeling”, the Taiwan subjectivity emphasized Wu type “structure of feeling”, both grass-roots and mainland China related Lee type “structure of feeling”, or the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speech searching Lei type “structure of feeling” are all par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aiwan news media workers and will become essential material for the coming new “structure of feeling”.

Keywords: identity, Lei Zhen, Li Wan-ju, structure of feeling, Wu Cho-liu, Zeng Xu-bai

* Eve Chiu is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n Hsin University, Taiwan.